

中日體驗與跨文化視域

——析論魏清德和吳濁流域外紀行*

陳惠齡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華文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摘要

同為日治時期台灣報人魏清德（1886-1964）和吳濁流（1900-1976），兩人皆有多篇域外紀行之作，其中尤以近鄰的日本和中國體驗最為豐富，諸如魏清德〈南清遊覽紀錄〉（1911）、〈東遊見聞錄〉（1913）、〈旅閩雜感〉（1915-1916）〈東遊紀略〉（1935）、〈滿鮮遊記〉（1936）等；以及吳濁流《南京雜感》（1942）、〈東遊雜感〉（1965）、〈東遊雅趣〉（1971）等等，皆是立足台灣，而廣涉日本、中國之跨文化觀感。在異域／本土、輸入／流動、交會／衝擊等體驗對比關係項中，突顯兩人體察中、日、台文化實際效能，以臻「新民」與「進化」論的記者心事。然而在文化遭遇中必然也經過不同主體意識的篩選、過濾，甚至改裝後的種種現代化體驗。「體驗」原關乎個體的生命存在方式，魏清德和吳濁流的中日體驗，因而也有各自表述、想像的歷史情境與文化視域。

關鍵詞：魏清德、吳濁流、中日體驗、跨文化視域、域外紀行

* 本文初稿宣讀於「2016第二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台灣文學與亞太人文的多元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國立台灣文學館等合辦，2016.06.25-26）。感謝翁聖峰教授評論提點，復蒙學報匿名審查者惠賜卓見，增益論述之周延性，特此申謝。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在『時間—空間』結構中的『竹塹意識』：竹塹文學的地景書寫及其地方詮釋」（II）（104-2410-H-134-018-MY2）之部分成果。

Sino-Japanese Experiences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An Analysis on the Overseas Travel Notes of Wei Ching-De and Wu Chuo-Liu

Chen Wei-Li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Encounters of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usually involve the convey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ncepts, perspectives, and other forms of knowledge. Wei Ching-De and Wu Chuo-Liu were both journalist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both wrote many overseas travel notes. Their travel experience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namely Japan and China, were particularly abundant. The contrasting relationships of foreign land/locality, input/flow, and interaction/impact, highlight the writers' perceptions towards the cultural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cultures, as well as their thoughts about "new citizenry" and "evolution" as journalists. However, in their cultural encounters, they also inevitably filtered out different forms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even embellished various experiences of modernization. The act of experiencing is primarily linked with an individual's way of life or existence. As such, individuals possess different 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self-expression/concept.

Keywords: Wei Ching-De, Wu Chuo-Liu, Sino-Japanese Experienc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verseas Travel Notes

中日體驗與跨文化視域

——析論魏清德和吳濁流域外紀行

一、前言：移動、文化身分與現代化想像

相較於日常生活中一成不變的安穩狀態，域外行遊因大範圍的移動空間，不僅開拓觀察事物的新視域，經由跨文化的穿越與尋異之旅，也會改變旅行者的知識結構。因此，行旅總是攸關著位置與觀看、位移與轉換等命題。¹此外，目接或神遇的移動紀遊，若安置於殖民地經驗的時間背景中，也將產生一種特殊的「歷史語境」，諸如對於西方世界或東方殖民帝國文化成就的好奇、想像與回應；或是對於殖民帝國與被殖民社會之間的權力差距，而產生民族意識的自覺、認知與反省。如李春生於《東遊六十四日隨筆》（1896）的現代性體驗；連橫《大陸遊記》（1912）的漢族文化認同；²林獻堂《環球遊記》（1927）的文化啟蒙論述；³杜聰明《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則銘刻知識菁英在離返之際的衝擊。⁴上述台灣文士於日治階段的旅遊載記，顯見已延伸至文化思辨、身分認同、種族階級與殖民地問題種種。

當空間移動，轉為書寫時，將涉及跨越歷史、地理與文化空間後的文本生產，並也因為觀看的視框、情境與位置，而涉及再生產的經驗總體。惟正如「斷片」的概念，作品本身並不真正的完整，而是有更多根植於作品之外的生

1 有關旅行與位移、跨越的論述，可參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03），頁1-5。

2 相關論述，可參徐千惠，〈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以及陳室如，〈日治時期台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台南大學學報》41卷1期（2007.04），頁33-50。

3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台灣文獻》49卷2期（1998.06），頁1-33；以及林淑慧，〈敘事、再現、啟蒙——林獻堂1927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台灣文學學報》13期（2008.12），頁65-92。

4 林淑慧，〈醫學訪察的記憶：日治時期杜聰明歐美之旅的敘事策略〉，《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1期（2015.10），頁1-38。

活和繼承來的世界。⁵特別是對於自我定位於「紹介世界最新思潮」的媒體報人，或自詡「視野比較廣闊」的新聞記者，⁶其遊記撰文動機更有別於一般。⁷

同為日治時期台灣報人魏清德和吳濁流，兩人俱為竹塹知名文士：魏清德（1886-1964），新竹市人，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曾任公學校訓導，1910年起應聘《台灣日日新報》記者，長達30年，長期擔任漢文部主任，瀛社副社長。吳濁流（1900-1976），新竹縣新埔人，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曾任公學校訓導，1941年任南京《大陸新報》，1942年返台任《台灣日日新報》，1944年任《台灣新報》，1946年《民報》等記者，為栗社詩人。魏、吳有諸多相似的背景經歷，並有交往互動，⁸且皆撰有多篇域外紀行，魏清德之作計有〈南清遊覽紀錄〉（1911）、〈東遊見聞錄〉（1913）、〈旅閩雜感〉（1915-1916）〈東遊紀略〉（1935）、〈滿鮮遊記〉（1936）等；⁹吳濁流則撰有《南京雜感》（1942）、〈東遊雜感〉（1965）、《談西說東》（1969）、〈東遊雅趣〉（1971）、《東南亞漫遊記》（1973）、〈南美遊記〉（1974）、〈印澳紐遊記〉（1975）、〈印非遊記〉（1976）等。上述魏、吳諸作皆是立足台灣，而廣涉日本、中國、朝鮮、馬來西亞、歐美之遊記與跨文化觀感，其中尤以亞太區域的日本和中國體驗最為豐富。

旅行中的諸般「體驗」，原關乎個體的生命存在方式，然而在文化遭遇中必然也會歷經不同主體意識的篩選、過濾，甚至改裝後的種種現代性體驗。魏、吳或於同時期，或一前一後旅遊創作於1910-1976年代，九〇年代適值世界交通日便，國際交涉日繁，現代文明躍進之際，文化、社會、經濟、政治與科技各方面的「現代化」內涵異常龐雜。所謂「現代」，乃意味著技術上的先

5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11），頁94。

6 分見魏清德，〈新聞記者之生活〉，黃美娥編，《魏清德全集》肆·文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頁84；以及吳濁流，《無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業公司，1995.07），頁2。

7 黃美娥即言媒體傳播與文明啟蒙任務，是釐析魏清德創作不能忽略的視角。見黃美娥編，〈主編序——發現「魏清德」意義〉，《魏清德全集》捌·目錄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頁5。

8 吳濁流，〈覆鍾肇政君一封信〉文中，敘及《風雨窗前》甫出版，即執作品就教於魏潤庵先生。見吳濁流著，張良澤編，《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頁11-12。

9 魏清德〈參觀平壤妓生學校〉（1910）、〈馬來群島殖產談〉（1910）二文，看似紀行之作，惟前者為譯作；後者則是訪談台灣三井物產會社檀野法學士而來。二篇也將適情況，列為本文論證資料。

進與高度城市化生活相關的社會態度。¹⁰ 值此時代的巨變，不僅產生了新的日常生活結構，也為現代人提供了對這一歷史巨變的特定體驗。彼時魏、吳或未必具有精確的現代化或現代性概念，但在諸作中則多銘刻、體現現代化的經驗與理念，諸如「精神物質、形式內容與文明相稱的相濟媲美」、「真正的文化應以世界為標準，非用科學方法研究不可」之論。¹¹ 惟誠如識者所論現代化等同於全球化或文明進化，在根源上有其鮮明的西方屬性，但在台灣，「早到的現代化」卻儼然是「日本文化優越性」，因此，「現代化」同時也是一種「殖民化」（即「日本化」）。¹²

兩人分處日殖階段前後期，不同時間跨度與文化語境的背景，對於殖民現代化的迎拒依違，心態自然有異，頗值得探掘深究。揆諸魏、吳域外紀行研究，計有黃美娥、林以衡諸文，黃文訴諸魏氏「漢學」觀及其以日本本位的東洋文明意識，並不措意於遊觀體驗；¹³ 林文梳理魏氏旅遊見聞，論述焦距在於魏氏反思東亞脈絡下的「漢文」與「儒學」定位。¹⁴ 相關吳濁流遊記討論，則以《南京雜感》為多，如林柏燕〈吳濁流的大陸經驗〉、¹⁵ 廖炳惠〈異國記憶與另類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¹⁶ 以及簡義明〈孤兒的眼睛——吳濁流遊記中的自我凝視與他者想像〉等文。¹⁷ 上述三篇皆以吳濁流中國經歷為要，並分別總結吳氏對於中國文化的「入」與「隔」心境、「文化批判」與「比較研究」的距離，以及「自我」與「他者」的界線等。另有白筱薇〈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及其相關作品研究〉，以吳氏1941-1942年之大陸經驗為

10 「現代」一詞，誠然可作為「歷史分期」、「社會學」、「規範性」、「文化、美學」等諸多概念的分析面相，惟針對日殖階段的台灣知識分子而言，應指「現代」的描述性術語及其體驗。

11 分見魏清德，〈時趨之瑣言〉，黃美娥編，《魏清德全集》參·文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頁86-105；以及吳濁流，〈黎明前的台灣〉，張良澤編，《黎明前的台灣》（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頁115。

12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6），頁12。

13 黃美娥，〈另類現代性——《台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啟蒙論述〉，《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12），頁201-212、頁220-229。

14 林以衡，〈日治時期台灣文人魏清德東北亞紀行的文明之旅與漢文體驗〉，《漢學研究》30卷4期（2012.12），頁241-274。

15 文訊雜誌社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94.03），頁334-356。

16 廖炳惠，〈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1.06），頁9-41。

17 林柏燕主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0.12），頁48-63。

觀察重點，藉此探明殖民地背景下的中國經驗，如何影響作家及其後來作品視角。¹⁸ 涉及魏、吳紀行諸作的比勘，僅見於黃美娥論文之精要斷語：

在旅行中，魏氏缺乏脫離被殖民而回歸母國懷抱的身分感動，反而不忘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得體，他不似後來吳濁流遊歷中國時所生發的非中、非日的「兩皆不是」矛盾感。卻有一種強烈向日本政權／文人靠攏的認同傾向。¹⁹

魏清德年長吳濁流14歲，就政治身分而言，魏清德遊歷篇什，創作於戰前日殖期間，可謂兼有「日本國民」與「台灣島民」的雙重視野；吳濁流行遊諸作，除《南京雜感》發表於戰前，餘皆創作於戰後國府時期，其前階段的立足點，與魏氏同，後階段則兼具「中國人」／「台灣人」的立場。紀行與歷史的交錯關係，致使兩人都必須面對文化衝擊、轉移或固守的情境，值得尋繹的是，此文化本根是「中國」、「日本」，或是「台灣」？在深受日本殖民同化政策影響下，即使分處前後階段的魏、吳遊觀與印象，是否也存在著建構「中日類同」與「東西差異」的大東亞文明共榮意識？當現代化已意味一種普遍性與效應性的變遷趨勢時，是否也有基於民族文化傳統思考，而抵拒墮入現代化殼中的內省觀點？魏、吳分處日殖前後期，具有相近又相異的歷史情境與記者經歷，其遊歷中日的體驗、觀看媒介與心理視框，援此而探究其殊異性或同質性，或可勾勒出從戰前到戰後台籍知識分子在跨國移動後的文化視域。

魏、吳域外紀行作品，內容豐富，博涉政治經濟、民生實業、各國風土等諸多現代化議題，此外，魏氏對於滿洲國、朝鮮教育、孔教漢學、科學新知的歷史感觸與觀察視景，以及吳氏針對宗教信仰、各國階級意識、觀光理論與創作理念的融合論等見解，皆見兩人銘記跨國越界的知識背景與思索課題，極富討論價值。惟限於聚焦論題以及篇幅，本文意在關注並比較魏、吳立基於台灣

18 白筱薇，〈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及其相關作品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19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208。

位置，所發抒行遊中跨文化的激盪（或觸痛），因擬以中、日紀行篇什為據，冀能藉由空間移動所生發異域／本土、輸入／流動、交會／衝擊體驗對比中，比勘殖民與戰後台灣知識分子體察中、日、台的文化經驗，及其各自表述、想像的文化視域與思辨立場。本文雖以魏、吳中日體驗為要，使用文獻材料也將擴及亞太諸國紀行諸文，藉資參照。²⁰

二、日本行旅的空間觀察與「國民性」體驗：「群體概念」與「塑造教養」

在旅遊中最常關注的是異國情調和異民族文化生活的各層面，包括食衣住行等現實日常，其中行旅者感受最強烈的「差異」經驗，應指空間景觀，以及各國的民情風土禮俗。東亞各國文化水準與生活型態，有其發展進程上的懸殊，因此，魏、吳的中日體驗，主要以環境景觀，以及國民性、制度、傳統與習俗風尚，作為書寫的呈現與陳述的理解。當目睹日本自律守法的群體精神，及其展示的國民教養時，在跨國與跨文化語境中，宣揚日本社會的優質集體性，間也反照台灣島民的弱化與浮動性。

（一）魏清德表彰「現代化地景」與日本「教養」

魏清德東行紀要，計有〈東遊見聞錄〉（1913）和〈東遊紀略〉（1935）²¹二篇長文。〈東遊紀略〉一文，載記參加東京湯島聖堂祭孔大典，內容旨在比異日、中漢學之發展，並綜論漢學要義（這部分將挪至後文處理）。最能表顯日本國民性，所謂「研究世界最優勝國民之言語動作、意志精神」的遊記，則為〈東遊見聞錄〉。開篇直指「十餘年夢想東都，遊未能遂，一旦社命忽下」，其後又補記「言論自由，思想發表之世界，江湖讀者幸不我

20 感謝匿名審查者提點「紀行」原是日本文體之一。有關【紀行】の解説：「旅行中の体験や感想を中心に書き記した文学作品。」參見《国語辞書一大辞泉》（來源：<https://dictionary.goo.ne.jp/word/紀行/>，檢索日期：2019.10.10）。從字面語詞而解，「紀行」可視為紀錄行遊之作，類同「遊記」文體。本文採「紀行」而舍「遊記」為題，非關日本文體之考量，而是取「紀行」的書寫重點，較諸「遊記」強調旅遊記錄，更符合魏、吳或公務或私人行遊，而非純粹「旅人」的背景。

21 魏氏曾於1935年參與「斯文會」在東京湯島聖堂舉辦「國際儒道大會」及「祭孔釋奠大會」，返台後於《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分十回刊載〈東遊紀略〉一文。魏清德，《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249-266。

罪」等，顯見此行是奉公務撰文的差旅。近二十日東瀛行，遍訪大阪、京都、東京、名古屋等名城，雖然航渡辛苦，魏氏卻油然而興「廿紀男兒，生當有世界的思想覺悟！」此番東遊，魏氏對於「汽車之往來若織，電車到處」、「街上無曳履徐行之人」的現代都市地景，以及「工場巍峨，層樓四級機械之運轉整齊敏捷」，機械發明的工業景象，最為驚嘆。顯見觀視焦點在於日本都會文明。

此外，也奉行歐美新思潮：「遊歷必觀察遊廓、劇場、博物館、公園、學校，知其國之風俗文化」，而頻密遊觀各藝文展館。「觀光」是認識文明境界的最佳見證，因引新渡戶博士之言，說明「觀光視察一事，最重擇善取法」，由是藉觀察母國（日本），呼籲台人以良善範例為法，「先求公德心之發達」，否則無帝國臣民之資格。²² 此外，更進一步揭櫫「東京精神」與「大國民之氣宇」：

鐵道電車，交通完美，市民機敏，活動奮鬥。京童意氣磊落，不分階級，居貧賤者，亦有自主自發自負之精神，……，而貴者富者之態度，亦不敢以驕慢見於詞色，人權互相尊重，罔蹂躪也……是真有大國民之氣宇。台灣教育不當養成這般人物哉？²³

引文首先突顯東京鐵道電車，四通八達的都會氣象，接著稱譽東京國民嚴謹有序，上下各守其分，允為標竿。在「回顧」的章節中，再次提及內地「公德心之發達」，如船車事事清潔，人們不佔據廣席，不高聲駭人視聽，不驕慢傷人。反觀台灣人的階級意識與現實功利，老人不知學敬，婦女不知愛撫，群眾自設階級等民生弊端，皆與東瀛視景形成尖銳對比。爰此，魏氏力主從學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面著手，透過教育來陶養大國民品格，教導本島人現代化生活習性。魏氏嚴詞批判，提醒台人取範，顯然是深有感觸，所謂「取法日本，革新台灣，迎向未來」，或許是此中真意。

22 魏清德，〈東遊見聞錄〉《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214、223、265。

23 同註22，頁232。

（二）吳濁流稱揚日人美德及都會景象

吳濁流日本行旅之作，主要為〈東遊雜感〉（1965）和〈東遊雅趣〉（1971）二文。另外，長文〈談西說東〉（1969）末段也略記東洋行。〈東遊雜感〉原為120首各地風光吟草詩作，其後再憑記憶綴拾，撰成遊記。²⁴

依據資料，吳氏於1919年曾參加學生團體觀光日本18天，²⁵此為初次日本行，其後旅日皆於戰後。究其遊日諸作，吳氏關照焦距為日本的人情世味——「人的風景」，尤其推崇日本女性的謙恭特質。〈東遊雅趣〉以「日人的教養」標題，專章探討日本國民性，²⁶主脈絡則是日本婦女的美德。全文概分三個重點：一是日女子的溫柔體貼，能代人分憂解勞，如協助穿越地下鐵、代購票、護送搭車等，皆見溫良禮讓民性。二則敘及日婦人的節制守分，如懷抱幼兒，觀歌舞伎而不強佔空位。三則禮讚日婦人鑑賞繪畫藝術的高超品味和風雅胸懷，不似台灣婦女乏善可陳。全文夾敘夾議，禮讚日本民情之際，也反襯台灣火車屢見霸佔搶位的亂象。雖是藉題發揮之作，但筆下東瀛城市的浮光掠影與市俗敘述極為盎然生動。

吳濁流於戰後的日本遊歷，純屬私人自由行程，因此大致以訪友、遊觀、賞景為主。具詩人本色的吳濁流，懷古憶舊，喜遊天然山水名勝，對於日漸近代化與西洋化的日本都會、景點，則直指「一切都俗化了」。〈東遊雅趣〉文中，雖一再表明不喜繁華窒人的都會場景，但對於社會經濟躍昇，全民得以共享高水平生活的都會景象，如原屬貴族階層專享的新幹線，竟轉為人皆可搭乘的大眾化交通現象，在大表讚賞之餘，不免憂心台灣日趨等級分明的火車類別，惟恐造成社會貧富階級意識。由是觀之，吳氏表述日本空間的視野與意識，還是落在「進步」與「均富」的議題上。

總攬魏、吳在現代性意義下見諸日人的教養，如守秩序、有禮儀、欣賞美等等，皆屬「公共精神」而非「個人私德」。足見兩人意在探討「群體概

24 吳濁流，〈東遊雜感〉，《談西說東》（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69.04），頁174。

25 吳濁流著，〈附錄〉，張良澤編，《台灣文藝與我》，頁209。

26 吳濁流，〈東遊雅趣〉，《晚香》（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1.10）。全書收錄漢詩（晚香、環球吟草和扶桑拾錦），以及論文隨筆（計14篇，中有東遊琉球和日本之〈東遊雅趣〉）。

念」、「塑造教養」與「國民性」問題。「國民性」的語詞和概念，源於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現代民族國家理論，主要以民族和民族國家範疇，作為理解人類差異的首要準則。²⁷「國民性」也即是「民族品格」，因此以發達進步的日本國民公德、人格氣質、社會秩序，作為重塑台灣國民性教育之標的，並藉此提振台灣國民性而臻於「文明進化論」。上述旅遊見聞與修辭姿態，說明魏、吳在日本所感知與交會的群眾公德，終究要連結至台灣的現實社會，且必然是同步於反思台灣國民性。

值得關注的是，上引兩作有關日人日常品德的精神實踐，所安置的空間場景主要是「鐵道電車，交通完美」的東京都，以及富麗堂皇劇場、歌劇院、地下鐵道驛、畫廊、美術館等現代摩登都會空間。論及教育與教養，首先包括一套教育機構網絡，諸如各級學校的教導陶冶等等；至於其他教育組織形式，則歸屬博物館、畫廊、劇院等具有展示文化、歷史脈絡的特定場域或社會閒暇公共場所。魏、吳遊記所展現「日本國民性」的現代化公共空間，不僅關乎現代國民教養和品格精神的改造，也指向現代國家建設的現代化實踐，一如魏、吳兩人所津津樂道於觀察日本群體形構的大都會視野，顯見塑造文化品格與現代物質建設二者必須合而觀之，方底於成。

三、中國之旅的空間視景及中國性觀點

日治時期所稱「亞洲」、「亞細亞」或「大東亞」，只是一個「地理名稱」，倘若從漢字與文化圈概念出發，亞洲多數國家既有某種共同的溝通方式，也有類近的知識結構與文化要素，²⁸因此可視為一個「文化實體」。此正意味著亞洲具有各國地方風土、民情與景觀的特殊性外，也攸關種族、文化、歷史與價值理念的趨同性。²⁹誠然，上述地理名稱與概念的變換運用，實涉及

27 Lydia H. Liu (劉禾) 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06），頁76。

28 廖肇亨主編，〈導論〉，《共相與殊相：東亞文化意象的轉接與異變》（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研究所，2018.08），頁2。

29 如台灣與韓國的密切關係，魏清德即以「誼若手足兄弟」形容之：「朝鮮今日之行政方針及官制組織、法律委任等，皆與台灣大同小異，可不知乎。」魏清德，〈朝鮮之氣候〉，《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127-128。

彼時日本對外政策與文化論述的策略，諸如亞洲一體性、大東亞共榮圈、大亞細亞主義等。在魏、吳東遊諸作中，除了詳細報導中國之旅的空間地理景觀，尤見兩人立基於台灣位置，所浮露「日本與中國和亞洲」的種種文化糾結，特別是各有所見，關乎「中國性」的論點。

（一）魏清德的公務考察及其中國遊記

魏清德中國行旅之作，主要有〈南清遊覽紀錄〉（1911）、〈旅閩雜感〉（1915-1916）和〈滿鮮遊記〉（1936）三作。遊歷地分別為廈門、汕頭、香港、廣東（州）市，福建省、滿洲國（今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和朝鮮。題名為〈南清遊覽紀錄〉，一是此行所經之地，皆與開放四港為通商口之南清條約有關，³⁰再則魏氏友人囑其「願以言文一致之體詳記厥事，庶幾不遊者亦得讀其記事，想像其大概。」³¹既是受囑託撰文記事，因此，名為紀錄而非雜感。〈旅閩雜感〉也是前往擴張經理閩報的公務行旅；〈滿鮮遊記〉則以考察滿洲國國情和經濟開發為主。總此，魏氏中國遊記主要以公務考察為主，並有其特定參訪地點規畫，概屬公派任務之集體遊覽載記。

1. 空間體驗與中國國民性觀感

魏氏所遊歷的中國城市，基本上都是商業城（廈門）、沿海城市（廣東、汕頭、福建）和國際都會（香港），較之彼時內陸諸城，堪稱繁榮區域。然而魏氏初履中國的第一印象，除卻香港和滿洲國之外，³²映入眼簾的廈門、汕頭、潮陽、廣東等地貌，率皆為「市街不潔，道路窄狹，臭氣薰蒸」或「市街狹窄，人力車不能通」的落後景象。³³廣東原是最早開化，具有革新規模之地，卻也敗落淪覆若此，遑論其他，不免感慨系之。不獨南清之旅如此，幾年後遊歷閩地，魏氏依舊對於「狹隘蹉跎之道路」頗多評議，甚至總結旅閩最厭

30 魏清德，〈南清遊覽紀錄〉，《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155-156。

31 同註30，頁136。

32 彼時滿洲國隸屬日本管轄地，魏氏行遊該地之體驗，自異於中國境內各省城。因此，〈滿鮮遊記〉，將留待下節析論。

33 同註30，頁138、140、165、151。

惡者四：一市上之惡臭，二飼狗之橫行，三肩輿之轎間，四喝熱酒，³⁴ 其中特別指斥衣裳襤褸甚於乞丐的轎夫，為官紳、外國人抬轎而揚揚自得，可謂劣等之國民性。

人類對於空間體驗，原本即依賴實有的景觀，而市容街道每每是旅人行遊異地的第一視覺印象。魏氏或已習於日本的整潔慣性，厲聲質詰中國不潔淨的景觀，誠屬必然，只是由空間映象，順勢轉為「國民性」與「文化層面」的譏彈，不啻藉此頹敗視景，指涉「中國現實」。

相形之下，對於英人殖民整頓香港九龍，則頗多稱譽，例如「香港道路廣闊，而地則甚狹，道路皆以紅毛土及石灰卵石砌成者，雖雨水，無泥濘難行之苦，有電車，……交通便極。」然則，魏氏目睹香港公園揭示「衣履不全者不可入」、太平山告示「不可亂棄污物」等辱華標語，卻無一語譴責英人歧視政策。類此稱揚英國民高大人格之篇幅頗多。³⁵ 觀其撰文的現實根源，顯然盡行投諸平行對應英國和日本殖民的偉業，所謂「夫自東洋大勢，同文同種及唇齒關係而言，則不宜排日，自台灣籍民而言，則更不宜排日。」³⁶ 這才是魏氏文以載道的背景。

「吾人側身由對岸以觀吾台」，³⁷ 是魏氏所有遊記中的心靈視景，因此敘事每每轉折至台民文明教育。然而認同本島民胞與清國為同文同種的魏清德，³⁸ 在中國空間體驗中，並未展現與當地住民「同一文化」的感知結構，浮顯的文化身分反倒近乎強者對於弱者的優越／殖民／霸權式的位階意識。又如登臨明洪武建造，歷經英法聯軍而倖存的鎮海樓古蹟，憑欄遠眺之際，竟也棄歷代漢詩諸作，而興發「誰能繼兒玉大將偉績」之嘆，³⁹ 徹底表呈牽繫於日本文化的孺慕之思。

34 魏清德，〈旅閩雜感〉，《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353。

35 引文分見同註30，頁144-145、158、159、163。禮讚英人之論，實為領事演說內容，但魏氏表明領事所論與他的觀察類同。

36 魏清德，〈南清遊覽紀錄〉，《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160。

37 同註34，頁346。

38 魏清德在〈讀高木醫學士講演美國阿片問題書後〉一文中，針對阿片（鴉片）之毒害，即將支那人和台灣人並舉而論，並言「本島之同胞人民與清國之同文人種」，一方面痛斥支那人民智識之愚，一方面也冀望本島人為之警戒。見《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75。

39 同註36，頁148-149。

然而這般高調張揚台籍親日派的皇民心態，或暗藏有公務在身，報導見聞，必須合於宣傳政令的職責考量，遂不得不應景表態。且看魏氏倡和英、日殖民文明啟蒙論述的同時，在許多遊覽敘事姿態中，卻又與中國文化時相交會，若即若離，如參觀銅壺滴漏古器物，先是浩嘆中國四大發明、哲理、法制等古文明輝光，接著則急轉為批判中國專制野蠻，以無用文學取士，遂退化迄今，以致各處要害利藪，盡為歐美侵略窺伺等。⁴⁰如是而觀，魏氏在遊記中雖不斷表彰殖民帝國主義文化視域，卻又深植感喟。真正的遊記敘事欲望，或有所障蔽，但輾轉糾結的行文，卻間接引渡出彼時台島知識分子精神世界中，糾結纏繞於雙重文化認同的線索。

2. 「輸出日本」與「大亞細亞主義」的書寫意識

魏氏〈旅閩雜感〉一文參訪與持論要點，主要為閩地學校教育、物產物流、閩學與閩省人士文化，而較少摹繪閩中山水名勝。不同於〈南清遊覽紀錄〉裡崇仰英人殖民偉業，且樂於為本島介紹歐美優勝之處，⁴¹或因閩省外人勢力盤據，首推美國，其次為英、德、日，加上此行肩負於此地經營唯一外籍報刊〈閩報〉之重責，〈旅閩雜感〉因此多措意於「輸出日本」，並急速擴張東亞民族主義觀：

吾人論至是，深慮我國人口，不足與白種競，舉支那全人口亦不足與白種競。……若夫本西洋歐字文明之白晳民族，一朝統一，厥數八億。……人口補充之無方也。……日支親善，必也兩兄弟發生國民的遠大自覺；日支箕豆相煎，東洋其不國乎？⁴²

魏氏所持論「日支親善」，也即是「和衷協力」的同化論基石。是故文集中屢見傳揚日本政府標榜「同文同種」口號，強調共享「殖民地台灣」和「支那

40 同註36，頁149、150、153。

41 同註36，頁159。

42 魏清德，〈旅閩雜感〉，《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362-363。

國」的「文化」與「種族」的類同性，⁴³ 同化論最終歸趨，在於建構「東方類同」與「西方差異」的大東亞共榮意識。〈滿鮮遊記〉一文也一再強調「我亞細亞民族」與「人種之差異」：

抑吾人此回之漫遊滿、鮮，益深感夫大和民族性及科學性之兩偉大也。……觀其日、滿兩國之相為生命，及東亞平和保全，大亞細亞主義之提倡，非僅依軍備之強……，而碧眼黃髮、人種之差異及蟹行文字，亦非守舊民族之所喜也。……日本人士之在於滿洲者又多通曉漢文，……於大東亞□局之執牛耳主盟，為極合理的，而且居於自然有利地位。所謂血濃於水，文字的、歷代的風俗習慣之共通點，在於感情上不至反撥。⁴⁴

彼時日本所高倡「亞洲一體性」或「大亞細亞主義」的「亞洲主義」，並不單純只是理論或口號，⁴⁵ 除了作為日本發動戰爭、對東亞鄰國的掠奪依據外，也涉及日本強化「亞洲」與「歐美」不同的同化策略。因此在引文中魏氏已清楚分判人種類別：西方人種與東方黃種，並藉此倡明大東亞區域的共生關係。論者嘗謂「假定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銘刻著西方與非西方、白人與非白人之間常見的二元對立，而日本帝國卻是被界定在文化與種族同一性的特殊範疇之內。……日本及其亞洲殖民地內部的文化與種族認同，是在日本與西方和亞洲關係雙雙面臨轉變的時刻所發明或想像出來的。」⁴⁶ 其意揭明日本殖民政權不僅為了確立自身殖民的正當性，更意圖將此類同性口號，整合進入「同化」與「皇民」的論述中。

日本與最重要的殖民地——台灣與韓國，以及中國，原有著相近的種族與類同的文化遺產，在魏氏〈朝鮮人之階級〉也述及與支那、朝鮮文化的同源關

43 魏清德，〈南清遊覽紀錄〉，《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173。

44 魏清德，〈滿鮮遊記〉，《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308-309。

45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07），頁25。

46 Leo Ching（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01），頁47。

係。⁴⁷在魏氏同化論述中時見「日本與西方與中國」種種對峙迎拒的關係，推敲其意，即在殖民帝國內部呈現為文化與種族的整合性，但在全球殖民體系中卻是表顯為東方和西方的區隔性。

「同文同種」是日帝國的響亮口號，魏氏遂常藉由台日比較，凸顯日民族在文化和種族上的優越性，⁴⁸並提出「母國能，而支那不能，本島不能」的質問與感慨，其日帝宗主中心意識，不言而喻。中國紀行篇什中，獨青睞且多讚譽英殖民地香港和隸屬日本政權的滿洲國，〈滿鮮遊記〉一文即稱揚日轄領「滿洲國」之東北諸城、軍事要塞、商業經濟建設，「今為我國聖地，誇示武功，獎勵後進，垂範於將來者也。」⁴⁹除此，針對旅遊所見各處之漢民族性，頗多負評，如漢人自弱體質，盛行鴉片，婦女纏足，文人陷溺於文章之美，氣息奄奄等等，⁵⁰皆是魏氏遊觀中可見可感的支那人典型。

承上所言，在其論點中儼然形成「積極進化的日本」和「因循苟且的非日本」二元構圖。然而魏氏雖表露親日臣服姿態，力主日中親善與大亞細亞主義，但〈旅閩雜感〉文中卻多有漢學的反思並痛陳中國時弊，例如專制之患、家族發達趨於極端之害、個人利慾、喜狹邪成群結黨等，且也具體提點革新之方，如改良政治、開發民智、富源增殖、提倡尚武教育、寄望海外開拓等等。凡此，皆是魏氏百難言宣的華夏之情。這華夏之思與皇民之心的百般纏結，正是彼時知識分子最深沉的情感礦脈。

（二）吳濁流的在地記者視角及其中國聞見

吳濁流於1941年1月至1942年3月期間，旅居南京，如前言所述，他1941年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並開始撰寫〈南京雜感〉長文，先是連載於《台灣藝術》雜誌，其後於1967年收錄於同名之《南京雜感》。⁵¹《大陸新報》（THE TAIRIKU SHIMPO）是中日戰爭期間，日政府設於中國的重要官方

47 魏清德，〈朝鮮人之階級〉，《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113。

48 〈同化問題之管見〉一文，即取內地人諸多美德，並置而論台人低級、腐敗、卑鄙等賤民品格，而突顯優劣高下。同註46，頁381-382。

49 魏清德，〈滿鮮遊記〉，《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273。

50 同註49，頁280、287。

51 吳濁流著，〈南京雜感〉，張良澤編，《南京雜感》（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頁50。

報紙。論者考察發現〈南京雜感〉原稿，原收錄有汪精衛及汪政權袞袞諸公相關載記，據此推估彼時吳濁流「可能」擔任社會線記者。若是，〈南京雜感〉則不僅是「遊記」或「旅行文學」的範疇。⁵² 吳氏撰寫中國聞見，是否類同於魏清德中國考察而概屬報社公派任務？或屬私人筆鋒報導？尚待考證。然吳氏撰述之際，確然具有記者身分，其報導與議論的觀照面向，必然異於尋常遊記的書寫情境。揆諸今版〈南京雜感〉撰文雖枝蔓，卻井然概分六大標目：南京雜感、南京的社會相、街頭速寫、南京的名勝古蹟巡禮、大陸的魅力、對中國的再認識。準此，撰寫要點並不在於穿梭南京的所見所聞，書寫樞軸乃在於思考「中國的性格」。⁵³ 吳氏嘗言中國視景，「無法從一定的角度觀察，使成統一系統，所以只將漫然的感觸，隨感情之噴湧，滴墨於紙上了。」⁵⁴ 因此以「南京社會群像」為起點，尋找支配中國社會的「中國性格」，也即是中國的「國民性」。

1. 南京社會群相與「中國性」

吳氏認為「南京是中國政府的中樞地，華北、華中、華南、華僑等的知識階級爽然匯聚，在某種意義上，可謂大中國的縮圖。」⁵⁵ 因此單以南京敘事取景，作為觀測並統攝「中國性」。在文章開篇，南京即以「政治都市」兼「田園都市」的兩重性面貌浮雕而出：

蜿蜒的城牆有三十四公里多，古色蒼然的、發霉了的封建時代的殘骸，像長蛇一般奔馳圍繞著四周。……寬五十公尺的近代道路，貫穿市的南北、東西，而這幹道，有時成了羊群家鴨的遊步場，有時趕著豬群的百姓的姿影點綴其上，出現了南畫上都少見的珍奇風景。⁵⁶

52 白筱薇比對資料，提出〈南京雜感〉原文中有六篇文章未被收錄於戰後出版的《南京雜感》譯本。這六篇文章紀錄了吳濁流對汪精衛及汪政權政要官員的觀感與交往接觸。緣於文章涉及汪政權，並予以正面評價，以致中譯本中遭刪除。見白筱薇，〈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及其相關作品研究〉，頁105-106。

53 同註51，頁52。

54 同註51，頁51。

55 同註51，頁52。

56 同註51，頁52-53。

在文中的南京意象，是一種駁雜混亂的城市景觀，一方面雜糅著菜園、桑田、墓地，及齷齪道路，一方面則秘藏著榮枯盛衰，興亡卻無損於渾成自然的美麗古都。

〈南京雜感〉攝錄中國社會群像，遍及各階層，如專屬南京特定階級的「阿媽」，並由此輻輳佣人、門房、茶房、洋車夫等共聚於南京的各色人物。順勢鋪展開來苟且、淫猥、頹廢的人事風景，尚有雞鳴寺乞丐群、講求賣身排場的煙花女子、終日聚賭的游手好閒者、蒼白知識分子，耽於雀戰看戲的「解放的新女性」、夢想當官發財的仕進者、明哲保身的漠然大眾，以及「在垃圾堆玩耍，在陰溝裡洗手腳，關心著街道上是否有遺落的東西」的南京「孩子們」……。

上述盤點南京浮世繪，除了揭現兼具正反悖逆兩重性的中國人格面具（一如南京城的雙面性），吳濁流更以其晶明洞見，直指中國社會風氣如此，迥非是權力傾軋鬥爭下的社會結構所致，而是舉國皆然，無分底層邊緣人或權位核心者，總之，雙方皆有兩重性的性格轉換與流動。此即為強哉矯的「同化力」與「機會主義」的中國性。⁵⁷由是可知其關注點不在於思考社會的「階級性」構圖，而在於如何賦予中國的國民性定調與結論。吳氏對於中國「國民性」的思考視野，顯然並非基於一種「知識」範疇的論述，而是揶揄來自殖民地台灣記者的文化背景與立場。在專注攝錄國民氣質習性外，他一方面也深思彼時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時局中，究竟承載了怎樣的「歷史意義」？

吳濁流用「同化力」來表現「中國是海」的包容性與影響力，然而什麼是中國的同化力？他抽絲剝繭，得出「大陸的魅力，是社會自由，富於娛樂性、機會性，生活形式簡單，富於人性之故。」中國人的人生觀，總是與「空想與甜美的希望」相連繫，因此只能等待機會。所謂的「機會」，即指僥倖性與投機心，再由此連結至經濟機構的僥倖性，「做官吏也是機會主義之一」。⁵⁸在〈南京雜感〉中可資解讀的中國特性，還有「菜館風景」中消磨度日，卻時刻

57 在《亞細亞的孤兒》中，敘及胡太明居留南京時也感受到「中國社會所具有的奇異的同化作用。」見吳濁流著，黃玉燕譯，《亞細亞的孤兒》（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5.04），頁145。

58 吳濁流，〈南京雜感〉，《南京雜感》，頁115、81、116。

妄想抓住機會的茶客畫面。「全憑命運，等待機會的來臨的悠閒，恐怕非中國人不能做到的。」⁵⁹這是吳氏對於中國特有「機會主義」，一針見血的概括語。

吳氏對於中國逐漸躋於近代國家之列，卻依然陷落於主從、上下、血緣、姻戚、鄉黨等封建網絡與投機心態，尤多批判。他對於可誅可議的中國人投機性格，頗有過人的論評：「粗看會使人有支離滅裂之感的中國，其實仔細觀察時，可以見出偉大而一貫的統一性。」⁶⁰這就是吳濁流以理性雜糅寬容，蘊蓄幽默、諷諭與嘆息的「中國人論述」。

2. 「中國是海」所表徵「混亂」與「同化」共構的社會體系

現代與古典，歷史與廢墟，文明與頹敗的奇詭並置，使吳濁流筆鋒下的南京，盡成奇觀，而縈繞其中的重要文脈，則是表徵「中國性」的「中國是海」的意象：

中國是廣大的海，廣袤四百餘州，……人民不止在國內，其餘勢成了華僑，散在南洋等世界各地。大海中有清流，濁流、下水道的水、泥水、污水、泉水等的灌注，混然一體，形成一大海洋。海有海的特色。說海的水是污濁的，並不會有什麼錯誤。……中國儼然像海，不論什麼樣的，全抱擁在懷中。……有潔癖的日本人，在中國住上三年、五年，便會習慣於環境，不知不覺間被同化。在污濁的後街，也會瞥見有教養的紳士，像中國群眾一樣站著解手的。……中國是海。是想填也無法填的海。是世界上不能沒有的海。不知海的性質，而以為海是危險的地方，無可如何的地方，而順其自然則不可；而想要清淨這海的企圖，也是不可能的。⁶¹

59 同註58，頁71。

60 同註58，頁117。

61 同註58，頁88-89。

吳濁流以「中國是海」作為「中國性」的基調，實源於中國遊歷的經驗。以「污濁」而「混然一體」的「大海」意象與角度，進行破解中國性，別有獨到而澄明的觀照，以及深重反思的真諦。

「污穢」原是一種被慣常分類系統排拒在外的殘餘物，當吳濁流將「中國性」視為「污濁大海」時，一方面固然「區隔」於潔淨概念，但一方面也將之帶入象徵「純淨系統」的聯結，藉此證成「污穢」隱含的兩重命題：相對於污穢，必然有一套符合規範的關係，同時也存有違反此規範的另一種系統，因此污穢自必有其體系，而且是作為一種反作用，用來抗拒任何可能擾亂或抵觸一般遵行分類體系的種種事物。⁶² 作者以複雜怪奇而混然一體的「汪洋大海」來喻示中國，明顯寓託大海所表徵污穢和混亂的力量。「混亂」雖意指無限，在其中找不到任何固定模式，但它將事物模式化的潛能卻是無限的，一如中國社會性與國民性的混亂失序，雖破壞了文明社會既定模式（秩序／澄清），卻也同時為社會模式提供了構成要素（失序／污濁）。

〈南京雜感〉論評的焦點，多集中於靜觀並探討中國社會人情世態，以及廣大群眾卑微欲念的強取與現實利益的交換，除了直指中國社會的暗影外，也暴露出中國國民性道德的曖昧性、污穢性與混雜性——兼容並蓄而沒有界限與尺度的仁義道德。吳濁流一再強調「想要清淨這海的企圖，也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社會卻像長江的濁水一樣，何時將澄清起來，是無法預測的」。⁶³ 這些判詞或可視為中國印象的極致表白，而「南京」也因此順勢成為窺伺中國人心靈荒原的重要窗口。饒富意味的是，吳氏提出「中國是海」的喻象，正反兩論皆具，如引文提及海納百污般的中國性，極易誘使久居境內的外國人，漸被同化而同流合污。然而他也承認，中國在經常變動混亂的痛苦中，總是頑強而偉大地存在著，一如入侵之異族屢屢被漢民族同化，可見中國具有很大的包容力，文化影響之鉅，可見一斑。凡此，皆證成中國如海納百川的「偉大的同化

62 本節有關「污穢」概念，參見Mary Douglas（瑪麗·道格拉斯）著，〈污染象徵秩序〉，Jeffrey C. Alexander（杰夫瑞·C·亞歷山大）等編，吳潛誠總編校，《文化與社會》（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1997.09），頁186-189。

63 吳濁流，〈南京雜感〉，《南京雜感》，頁93。

力」，此之謂「大陸的魅力」。⁶⁴

吳濁流自陳撰文初衷，乃緣於日本教科書對「自己的祖國」（中國）的負評視景：「鄰國是個老大之國、鴉片之國、纏足之國，打起仗來一定會敗的國家，外患內憂無常的國家。」⁶⁵ 故而想親炙並理解中國，然則他終究無法完成界定中國，僅能以中國和日本是「同文異趣」，無法以日本尺度來理解中國，作為結論。

廖炳惠論及吳濁流「企圖以旅行來移替並舒展他在台灣這個殖民社會裡的另一種身分（中國人）」，卻終究體會到台灣既不如日本有秩序，也不像中國那樣雜亂的「異樣現代性」。⁶⁶ 誠如廖文所評述，吳氏身為台灣人，必然坎陷於中日兩種敵對都會文化觀的拉鋸中，然則其所聲明「徒然拿日本的尺度，……是非常不當」之洞見，理應從上下文來判讀。揆諸其文：「日本一度喧嘈再認識中國的論議，事實上中國的再認識並非簡單的事」之論調，⁶⁷ 不僅回應／顛覆了日本教科書上的中國論述，也間接坐實了吳濁流對中國的持續辯證——「對中國的再認識」。

上述魏清德和吳濁流的中國紀行，都不免有冷眼旁觀中國社會，而論之評之的尖刻或尖諷意味；兩人相近的行遊時間（二戰前），也反照出同一歷史階段的殖民地台灣歷史背景，即或如此，魏、吳兩人寓有不同目的論的移動與紀行，不僅涉及書寫的定位，也形成差異的敘事距離，表現出兩種不同的中國體驗。

相較於吳濁流長期定居南京，有「介入者」主動發現的深入觀察位置，魏清德諸作，雖也有揮之不去的「由對岸以觀吾台，覺人民之活動、行政之設施、社會之組織、經濟之狀態，別是一副廬山面目」⁶⁸ 的對照意識，但因魏氏以「母國人」（日本人）身分兼有公派參訪的任務，不免明顯流露出文化與審美經驗的分離性，亦即是訪客與當地住民之間的文化位階差異，以致中國遊記

64 同註63，頁89、114。

65 同註63，頁51。

66 廖炳惠，〈異國記憶與另類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另類現代情》，頁21。

67 兩處引言，見吳濁流，〈南京雜感〉，《南京雜感》，頁119、117。

68 魏清德，〈旅閩雜感〉，《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328。

隱然是一種官府式居高臨下的文化批判論述的產物，⁶⁹並藉由中日文化高下立判而力主日支親善的文化同化觀；反之，吳濁流雖也帶有日方官報的記者身分，不無以批判、質疑和辯證，來勾勒中國性，然書寫視角卻更近於「在地觀察」與「庶民面向」，而他的南京書寫，也因此而透顯出另一個端倪：即使以日本文化為尊為貴，似乎不必也無法排除中國發展出迥異於日本的文化面貌。

四、跨文化視域、立場與反思：現代化體驗與第三世界的在場性

「旅行」概念中融攝有移動、觀看、角色位置與歸返等種種表述，同時也發散出「旅行幫助我們找回自己」、「旅行是思想的喻詞」、「旅行是一種歷史視角，人類心理『過客』的喻詞」等詮解。⁷⁰論者嘗謂：「自我與他者的互動連結過程，或者展現彼此排斥對抗、既分且合；或者展現彼此交互滲透、他我不分，呈現一種動態融合。前者是間文化研究及後殖民研究的立場，後者則是跨文化研究的立場。」⁷¹以「廿紀男兒，生當有世界的思想覺悟」、「藉此亦可以吸收多少現代知識以開茅塞」，⁷²作為移動命題的魏清德和吳濁流，顯然是以「遊觀」來接榫「世界」和「現代」，而臻於跨文化想像。然則與異文化接觸，固然因互動會通、交流轉化而產生質變，卻未必是彼此的融合交疊，或他我難分，也或許是更多的差異顯現與抗拒認同。

（一）魏清德遊觀的文明思辨：文化交匯視野下的進化／同化與殖民論述

當選擇旅遊參訪時，行動本身即已代表接受移動位置後的新空間，以及伴隨而來種種新視域與新思維，所產生跨文化的想像。惟遭逢異文化，或可能提

69 依據廖炳惠所言旅行所引發的權力關係，並非由某一方主導，而是在相當程度上是論述形塑過程的產物。見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台灣與世界文學的匯流》（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6.05），頁182。就魏清德中國行遊記而觀，實有其單方直線的宰制觀，或因魏清德遊記中時時表露身為日本國民的優越感所致。

70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頁1。

71 彭小妍主編，〈跨文化情境：差異與動態融合——台灣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06），頁5。

72 分見魏清德，〈東遊見聞錄〉，《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212，以及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05），頁1。

升所知所思，而賦予自己人民、社會和傳統的最佳知見，然而文化也經常以攻擊性姿態和民族與國家結合在一起，使「我們」和「他們」區別開來。⁷³特別是處於殖民地歷史階段，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對話意識中，也必然涉及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交涉中的不平等位階。

1. 近代化成果與社會歎聲

〈東遊紀略〉一文，堪稱最全面展現魏氏漢學觀之作。其志在明德新民，因此標舉重興漢學，惟若「漢學而外不知有學，迂闊也，不善用也。」所謂「漢學以外而有學」，主要指涉「西學」。漢學復興以「致澤」為要，因此不可不採歐美科學、致用及制度，但亦不可一味醉歐盲從，不暇採擇。⁷⁴這是魏氏「具國家觀念，應世界潮流」的維新進化觀。

總覽魏氏旅遊紀聞，其啟蒙論述核心，主要以日本作為文明進化論的理想國，〈東遊見聞錄〉（1913）一文最能體現日本帝國文化之嚴謹性與典範性。藉參訪日本各大都會、紡績會社、拓博展覽場、新世界等地，看到母國諸多近代化成果，魏氏念茲在茲的文明進化綱目遂井然呈現為：教育普及、泯除階級性、發達國民公德心、尚武精神，以及鼓勵遷植海外等，主要攸關教育民生、社會經濟和政治開拓等三大論題。

魏氏於〈時趨之瑣言〉嘗言：「教育故能有實業之思想，惟教育故能脫絀袴習氣，趨實地而積經驗。」認為現今半開化失敗之世界，肇因於不設學校，教育程度不高之故。⁷⁵而今東遊之際，眼見日本「民氣之盛」，更加體悟惟有教育普及，才能文化大開。此外也提及日本新女性問題和婦人解放運動，雖所論不多，點到為止，卻是由此鏈結階級制度的變換，蓋「世界風潮，日將月就，發達之速，有不可令人抑遏者矣。」⁷⁶其意認為各種閥閱皆可打破，惟貧富差隔無法破除：

73 Edward W. Said（薩依德）作，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1.12），頁4。

74 相關論點，參陳惠齡，〈從〈東遊紀略〉管窺魏清德漢學觀及其同化論述〉，《經學研究集刊》20期（2016.05），頁87-100。

75 魏清德，〈時趨之瑣言〉，《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98。

76 魏清德，〈東遊見聞錄〉，《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261。

會社壟斷，細大網羅，貧人側眼，束手無策。……是富者、貴者得受教育，頭腦亦佳；貧者、賤者不得受教育，頭腦亦不佳。雖曰憲政治下機會均等，無資本、無頭腦，烏望其爭競哉。⁷⁷

魏氏嘗行遊京都市街，見路旁家具、古物成列，原疑為春季大清潔，其後方知都會貧民設攤販售。不由得慨嘆「都會如此，地方奈何？」「得觀光者如此，不得者又將如何？」⁷⁸遂反思文明躍進，竟衍生如此「社會歎聲」之弊，因此疾呼倡導教育普及，俾能解決貧富階級差距問題。

2. 尚武的日本英雄與羸弱的漢人體質

「強國必先強種」的論調，其來有自。一如梁啟超「新民說」所論：「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⁷⁹有關身體、國家與國民的關係譬喻，頗能說明魏氏所形塑日本「尚武之國」的敘述機制，及其綰結「軍國主義」、「英雄崇拜」，以及「海外拓殖主張」意識，所結合成一套帝國／國體／身體的論述：⁸⁰

尚武信美事也，弱肉強食之今日，非軍國主義不能。海外發展，近時歐美政客、學者盛為唱道。以上所舉條件，皆含有英雄的及適於今日競爭之要素也。內地人喜飲酒，亦英雄的氣宇。……酒，興奮劑也，能使其氣昂進，不似鴉片之沈淪不振。……稍易念頭，可利用為沙場決死之人。⁸¹

引文中以支那嗜鴉片與日人喜飲酒之殊異文化為例示，並論評支那人讀孔孟之

77 同註76，頁263-264。

78 同註76，頁263。

79 梁啟超，〈新民說·敘論〉，《飲冰室全集》（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4.03），頁1。

80 此處國體解釋與用法，主要指日本國家形態的普遍性概念，並不涉及嚴謹或複雜的「國體」界定。至於「身體」論述的問題化，也只就魏清德比較中日文化強弱特質而簡要論之。

81 同註76，頁259-260。

書，尊重仁義，深信因果，到處有勸善之講演、路旁奉茶及施捨棺木、放生諸善舉者，此皆日本未曾聞見。遂以此柔性漢文化思想，對比日本傳統精神：日本刀、武士道和櫻花魂等「尚武」之道，以至復仇、冒險、敢死、功利、機變，皆是日本學校教育和社會陶冶的項目。類此尚武身體論述，尚見於〈滿鮮遊記〉文中所倡獎勵體育，也免漢民族墮墮於自弱體質，氣息奄奄的民族文化陋習；⁸²〈遊閩雜感〉一文也提及彼時東遊東西二京，隨處可見「小學校兒童角力其間」的尚武教育，不由得魏氏大嘆「豈榕垣泱泱大都，無一救國男子耶？」⁸³或緣於彼時日本教化之重點綱目，及殖民台灣的公學校教育內容，皆有明確規定「注重科學知識的修養」和「育成強韌的身體、鍛鍊成勇敢之精神」等宗旨。⁸⁴故而針對尚武精神的激進性立論，似乎有意引伸為傳統中國儒學的危機，並藉機規模出台灣教育方針。管窺魏氏尚武之論，似肇基於同化於世界文明之本心，非徒同化於大和民族之精神，因此以「尚武」為介質，惟就中仍難掩日本軍國主義文化本質的立場，並蓄勢而發為海外殖民支配論述。

3. 從移民到殖民的人種陳列場論

魏氏〈東遊見聞錄〉闡述日本拓植海外之論，⁸⁵大致有三面向：一為紓解日本人口密度問題，二為經營海外實業，三為政治強權的考量。據魏氏所言，「民族之膨脹於海外，支那人號稱特色」，⁸⁶而後日本當局才效法、鼓舞海外發展。但中國的殖民，基本上是「移民」概念，並非日本鼓勵母國人遷植移居於殖民地，「永住土著，與本國同一國性之經濟團體」的「殖民」觀念。而日政府為了使日人周知植民地方資訊而永住殖民地，並設有拓博坦（博覽會），羅列殖民地之產物與事件。

日本植民政策概分為北進（經營鮮、滿）和南圖（以台灣為基礎，並擴

82 魏清德，〈滿鮮遊記〉，《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287。

83 魏清德，〈旅閩雜感〉，《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360。惟魏氏於此處吐露「江山美好，實實主易地，輿圖變色，及今不圖，將安及哉」之慨，隱然有中國情結。

84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11），頁139、416。

85 在《魏清德全集》中，或作「植民」或「殖民」，皆有之。

86 魏清德，〈東遊見聞錄〉，《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247。

及馬來和南洋諸島）。魏氏曾訪談台灣三井物產會社檀野法學士，親聆其針對馬來群島殖產而發「人種陳列場」之論。⁸⁷其論將植民地民族析分甲乙（甲為白哲人種，歐美、日本國民皆屬之，支那等人種皆降為乙種），待遇各異，等級畫分後，即限制自由，如牛馬般使役。檀野法學士的海外拓植論，迥非文化交流或文化吸收的雙向互動，而是以「征服者」之姿，預設了當地土著是沉默的，理應被統治、被征服。

類此文化霸權觀也反映在魏氏參觀東京動物園，當觀看鳥獸爬足類，供人賞玩時，即大發議論：「人智在萬物之上，故能使萬物為權利義務之客體，淘汰競爭，劣敗之人種亦當降主體而為優勝者之客體，不能無思。」⁸⁸推溯魏氏東遊撰文背景，適值美國排日之際，因此以高蹈之姿，力主植民地之必要，並強調是列強所倚為生命者，文末並引法經濟學者所言：「殖民地最多之國家，可稱世界強國，今日不然，明日必然。」⁸⁹從採訪檀野法學士的殖民觀點，到東遊見聞的發論，魏氏認同日本殖民思想，自有其處於歷史時序的「皇民」身分背景，惟面對日本宣揚海外拓植，創業興國，甚囂塵上之際，卻又以達爾文「優勝劣敗之進化論」和區分先進或落後的「種族等級階層」理論，可謂強勢附和了日本殖民主義與同化思想。

（二）吳濁流遊記的內省觀點：攝取現代化下的對抗性認同

身處日本帝國疆域內外的理念和個人體驗的敘事模式，即或各有不同，但追求近代文明，畢竟是魏、吳共同的交集。吳濁流遊記中的現代化體驗時間跨度為1942-1976年，空間則徧及五大洲（本論文主要以中日體驗為範疇）。看到政權嬗變後更廣闊的世界，吳濁流對於世界現代化之下的文化交涉，顯然有超越於魏清德更多的思辨與內省觀點，這自是時移世易背景下，面對不同階段現代化情境下的遊記敘事，二者雖不可共量，卻可視為延續而值得觀察與比異的歷史經驗。

87 魏清德，〈馬來群島殖產談〉，《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54。

88 同註86，頁233。

89 同註86，頁264。

有謂旅行移動中牽涉到旅遊的科學結構、情感結構和心理符號機制等因素，諸如在「科學領域」中與交通工具、旅遊路線、同行同遊者、旅行資源資訊與旅遊概念等皆有錯綜關係。⁹⁰綜觀吳氏歷次旅遊，除了〈南京雜感〉所述是另類旅遊形式（長期定居異地的類在地遊記），以及〈東南亞漫遊記〉的組團遊覽（旅行團主要為機器工業業者，行遊目的是參觀香港1972年的工業展覽會），其餘皆是一般旅行社規畫行程路線。依據吳濁流多篇旅遊札記的自白，他的旅行只是點和線，而沒有觀察面，即使有印象感想，也直如瞎子摸象般。⁹¹由是，在多篇遊記中呈現的現代化體驗，諸如現代女性形態、摩登城市風貌、教育機構、各地文化藝術風潮，以及生活日常變貌等等，皆只是現代化體驗的多角景象之一。

1. 中日新女性形象與現代化體驗

行履中國，吳濁流現代文明的初體驗，始於上海都會風景線。受到都市物質與商業文明的影響，現代都會已然是一個集合性意象，包括看得見與看不見的都市內外景觀，其中夙有「中國境內的外國世界」之稱的上海，都會風貌更顯繁華而奇異。顯而易見，吳氏對於雜然林立，怪物般的水泥叢林建築，人車奔流熙攘的現代都市生活，並不樂於接納，在遊記中他形容上海的大廈高樓使人「神經尖銳化」。⁹²來到南京後，目睹現代女性的開放樣貌，所謂「罹患打牌、吃飯、看戲三大病的中國現代女性」，⁹³遂又引發另一種現代觀感：

中國的現代女性完全陷溺在虛榮與解放的思想中，無軌道的享樂在無知階級少見，有錢有閑階級為多。他們和她們，……上下一氣。⁹⁴

90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台灣與世界文學的匯流》，頁183、190。

91 吳濁流，〈談西說東〉，頁168。此外，在〈東遊雅趣〉也提及「原來我的觀光，看山水賞風景為主，而且有時欣賞古代美術，至於關乎歷史，或有歷史性格的東西我都沒有太大的興趣。」（頁207）

92 吳濁流，〈南京雜感〉，《南京雜感》，頁55。有關上海都會內外景觀刻繪，可互文參閱黃玉燕譯，《亞細亞的孤兒》，頁138-139。

93 同註92，頁59。

94 同註92，頁59。

面對爭取性別平權，不重視貞操的「新女性傾向」之現象，吳氏頗有處於新舊文化交涉之際，卻進退失據的歷史感喟：

她們無非是企圖打破五千年來的歷史的矛盾，而大多卻是無意識地追逐著現象罷了，只是靠淺薄的感覺在跳躍而已。……禮教之邦的禮衰微後，將產生什麼呢？到新文化確立以前，會有長時期的混亂吧。⁹⁵

其意認為追求時尚的中國女性，受英美思想蠱惑中毒而囫圇吞下新潮文化，以致風流玩世。然而對於日本東洋女性新面目，卻不瞠目以對，而是引用有趣的「襪子理論」，來刻繪戰後日本女性的「強壯」：

戰後日本的婦女確實強起來了。……她們從經濟上自給自足來自己獨立，以不靠男人也可以生活為目標，或以為理想。所以她們在學生時代就像男生一樣，拚命吸收知識，拚命旅行來充實見聞，由這點來看，比戰前確實長足的進步了。……現在日本女性比襪子更強韌了。⁹⁶

「日本娜拉」強壯的原因，一是法律上得了平等，二是社會上不靠男人也有飯吃。在更早期的〈東遊雜感〉中，也同樣禮讚日本女性自覺地剝除了對男性的依賴性和奴隸性。述及日本新女性風貌，則歸功於日本戰後善用法律來保障男女平等的「現代化制度」，因此，即使女性貞操觀與婚姻觀改變了，日本社會風氣卻為之「正經」，而成為可喜的現象。對於日本社會的開新風氣，顯然多了讚譽，而少了嘲諷南京女性失德的社教意味。針對中日女性觀點殊異，或謂撰文背景的「時間差」所致（1942年與1971年），惟吳氏對於日本女性情有獨鍾，遑論新舊派女性，他都覺得合宜合度，顯然不同於品評中國女性的嚴苛眼目。可見，非關與時俱進的觀念進化，而是有其強烈而主觀的愛（日本女性）惡（中國性女）取向。

95 同註92，頁87。

96 吳濁流，〈東遊雅趣〉，《晚香》，頁209。

對於性別平權的關懷與期許，吳氏的仗義執言也同步轉向台灣女性平權的關懷，他強烈抨擊金融界限定女性結婚後辭職的不合理與不人道。有關婦女主權意識和女性問題，在吳濁流遊記的現代化體驗中，確然佔有明顯的位置。

2. 南進思維中的台灣位置

在載記旅遊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的《東南亞漫遊記》（1973）文中，吳濁流提出台灣應轉進東南亞，以經貿為主，進行雙向交流之論，最能參差對照魏清德所承載日帝國以政治為出發點，海外疆域拓展與征服之神聖責任。

七〇年代初，適值台灣退出聯合國、尼克森訪中國，簽署「上海公報」、日本與台灣斷交等風雨飄搖之際，吳濁流在遊記中雖未提及台灣遭受國際排斥與壓制，卻藉由旅遊東南亞的觀察省思，提點前進南洋，革新保台的另一種懷抱與企圖，顯然也是回應彼時在國際孤立狀態下的台灣現代化問題。

體現在《東南亞漫遊記》的肌理，主要是反美批日，立足台灣，放眼東南亞，因此鼓勵台灣青年，「不宜單走向美國一條路」。文中點撥台灣對東南亞的認知不足，可謂高瞻遠矚，此外，在南進前瞻性的描寫中，也輻輳出重要的敘述核心——「華僑」和「語言」：

馬來半島及印尼的廣大地方都是青年們用武之地，這新興國家，都欠技術人才，期待我們合作，尤其是對台胞最有利，各地都有華僑…我們大學須要加設南洋系，或加設馬來語中心。……我想今後在亞洲人，應該學習華、日、英、馬四種語言及文字。⁹⁷

在異地與華僑相逢，總令人油然而生鄉土情感與故國情懷，特別是南洋地區，閩南、潮州與客家人居多，與華僑合作，自然更勝於言語不通，文化殊異的外國人，這是在經濟決定論底下的文化觀，間亦反照吳氏胸懷中華民族的集體性

97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頁40。

思維，而提出學習南洋語言教育問題，更豁顯出他先進的世界觀。吳濁流並未將東南亞視為廉價勞力生產基地，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台灣人的優越感，反倒是列舉東南亞許多值得學習的迷人特質，諸如民風良善純樸，樂天知命。其意認為彼時提倡文化復興，但切不可陷落於狹義的民族思想圈，鎖死文化而成為排他性，必要將自家的優秀文化與世界文化共進，才有發展與意義。⁹⁸

上述透過吳濁流觀光見聞的描述，傳達戰後七〇年代台灣社會宣導「南向」信息。學習南洋語言教育、經濟移民、扶植與推展各項南洋企業等觀點思維，大抵不脫日治時期的「南進」史觀與政策。日本於大正4年（1915）即於東京設立「南洋協會」，台灣支部同年設立，因此南洋協會與台灣的關係密切，設立之目的則以蒐集南洋的資料，作為政府前進南方的基礎知識，並培訓南進的要員，發行南洋相關圖書、刊物等。⁹⁹ 吳氏東南亞行，係隨團旅遊，不具有記者身分，自不同於身負日帝國「南圖」使命的記者魏清德所面臨彼時的國際局勢與觀照視野。處於戰前不同歷史情境中的魏清德紀行，採取的是「政治殖民」的定向，意在征服人種、開拓日帝疆界；而吳濁流立基於中美斷交後的時空背景，因此是以「經濟移民」為導向，意在與華僑合作、鼓勵青年脫美南進。

3. 內向遊觀中的文化身分

有謂在行游的時空轉移中，行游者總是處在不斷的文化認證之中。此乃因旅行有雙重性的面對：一方面是對於他者文化有一種陌生感，必須要求自己做出判斷和選擇；另一方面則藉由他者文化，反照對自己的文化做出比較與判斷。¹⁰⁰ 爰是，與異文化邂逅，雖然是一種文化吸收，同時也是一種文化認證或文化身分的確認。

吳氏在漫遊五大洲，觀光20個國家，41個地方後，非但沒有產生文化主體消散的滯厄，亟亟回歸的反倒是更加確認自己的文化身分。其意認為西歐近

98 吳濁流，《談西說東》，頁33。

99 有關日本南進策略與史觀之資料，參見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灣》（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04），頁11-31。

100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頁135。

代文化有其根柢，因此有其量有其質，有深度幅度。相較於此，美國和日本則顯薄弱，主要是本身沒有深厚的文化資本。反觀台灣有固有文化的深厚傳統，「只因五四運動之後一切丟掉，竟產生無根青年，浮萍似地任西風搖。」吳氏對於固有文化百難告解的情結，尚可藉他於1969年參觀日本紅卍字會祀祭觀音的典禮為例示：

他們用中國古代的儀式舉行五獻禮，可是我們的社會連三獻禮都不懂，一味以倣洋為能，連三獻禮都忘掉，如今有人用此儀式的話，就會被視為老古董。最可憐的是，台灣的社會自己沒有禮儀，像洋非洋，像日非日，完全是滑稽作法。一國國民，沒有一定的禮儀，令人可哀。¹⁰¹

不獨吳濁流有禮失求諸「日本」之慨，魏清德於1935年東京湯島聖堂參加祭孔大典後，也有此浩嘆：「（祭孔）舞樂皆傳自中國，然中國今已無存，所存者厥惟日本。」¹⁰² 魏、吳兩人相隔近30年的旅日心得，倒是英雄所見略同。吳氏尤其稱許泰國的文化回歸，在《東南亞漫遊記》中即一再強調泰國的復古懷舊，諸如女性服裝、裝飾、美術、工藝等等，都帶有歷史性，連帶的市民也和順親切，討人喜愛。¹⁰³ 這樣的宣言與告白，意在禮讚泰國雖努力走向現代化，卻尊重且維持自己的文化和傳統，不像台島的中國人盲目模倣，徵逐現代化。凡丟棄一切傳統和優點，忘卻自己，吳氏就名之為「奴化」。當看到西方人帶著泰女乘坐快艇，不免也思及在台島看到西人攜伴台灣吧女的模樣，因而有感於「東方的悲哀」。¹⁰⁴ 吳氏從旅遊中論文化、看政治，琢磨參照不同文化的異同，並牽引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突顯出文化自卑與文化奴役的文化身分位階，充分表露了第三世界的在場性。

吳氏述寫並強調文化傳統的同時，遙相對應的也即是各國在現代化衝擊下的歷史劫毀。例如側記戰後第二次遊日，只覺櫛比鱗次的高大建築物襲向身

101 同註98，頁156。

102 魏清德，〈東遊紀略〉，《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251。

103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頁13。

104 吳濁流，《談西說東》，頁15。

軀，獨步其間，宛如走在深谷底下，加上日日迷路，到處瞎闖，受盡電車和地下鐵路的氣，東京因而從昔日的「交通完美的帝都」變成了「一所魔都」，並不適合人居住。其後也批判日本科技掛帥的後遺症——依賴機器之後，人們丟下了農村，往大都市裡擠，逐漸變成了一個個機器人。日常節奏變調如此，連日歌舞伎也產生西洋化的質變，而失卻傳統日本色彩。¹⁰⁵ 在他的旅遊觀中，心所鍾愛的是事物的舊面目殘留，而非觀光景點的人工造作、近代化與俗化。¹⁰⁶ 「最喜東方皆復舊，莫教歷史轉相同」，¹⁰⁷ 可謂吳濁流思辨現代化的最主要線索。

五、結語：在歷史時序中的「文化身分」與「遊觀位置」

論及身分通常暗含了某種持續性、整體統一及自我意識的概念，因此，只有面臨動盪和危機時期，既有方式受到威脅，身分才會成為問題。例如當涉及侵略、殖民或其他形式派生的文化交往形式時，就必然會存在著衝突和不對等，此時就會浮現「文化身分」問題。文化身分的形成與界定，主要是藉從對於「他者」的看法為前提，而涵括了對於「他者」的價值、特性與生活方式的區分。¹⁰⁸ 在跨國行遊與諸般文化碰撞過程中，雖未必關涉強大軍事、政治或經濟等權力衝擊，但因為與異文化交流的體驗，往往涉及知識、概念和觀點的轉變或傳輸，特別是魏、吳創作或報導之際，皆身陷於日本（內地）、中國（支那），以及台灣（本島）的三角關係中，並未能逃逸於台灣殖民情境的惘惘威脅，因此書寫者觀照異地風土與異質文化時，對於「文化身分」的概念反思，自然也時時穿梭於紀遊諸作。

有謂「身分認同儼然是一個時間的範疇，而不只是一個存在的、文化的、政治的或地理的範疇。」¹⁰⁹ 誠然，魏、吳兩人處於殖民地台灣的風雲際會，

105 分見吳濁流，〈東遊雜感〉，《談西說東》，頁178、222、202。

106 吳濁流，〈東遊雅趣〉，《晚香》，頁178。

107 同註104，頁183。

108 見Jorge Larraín（喬治·拉雷恩）著，戴從容譯，《意識形態與文化身分：現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場》（中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01），頁193-195。

109 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04），頁269。

實有歷史進程的時差：分屬日殖前後期。然則對照魏、吳遊記所寓含文化識見與政治立場，卻絕非是簡單的時序身分的分殊可一言蔽之，更何況他們所處的時間背景，大致是世界競爭激烈，國際交涉日繁，「文化混融」的現代社會。因此，魏、吳作品中對於台灣之外的世界之再現對比，以及藉由對比而反襯台灣的描述，其對比的內在模式除了時間和空間之外，¹¹⁰ 理應還有重要的遊觀者的主體位置及其心靈視框。

魏、吳遊記諸作既是從離開台灣為起點，則台灣以外的空間場景，皆是作者透過感官攝錄而反省觀照的台灣對立面。在魏、吳兩人跨越歷史、地理與文化空間的遊歷文本生產所涉及的經驗總體中，諸如魏清德於日治時期見諸「進步優勝」的日本帝國、「卑弱退化」的支那民族和「仍守故陋」的本島人；吳濁流則於戰爭前後標舉具有「混亂性」與「同化力」的大陸魅力、有教養與公德各項優越感卻無「他分」的日本，¹¹¹ 以及「文化沙漠」的台灣。¹¹² 顯然兩人的關懷焦距都在於人類文明的總體形相，對於現代化的認同意義，遠大於對於民族國族的認同意識。

此外，魏、吳兩人的文化身分形塑，也涉及認同與文化歸屬的心理機制，除了文化、民族、國家認同的內涵有不同時期的變化，也包括自我生命特質、學術背景、職業身分、經歷種種。魏、吳的舊學根柢與漢詩人角色，讓他們共享並承繼了挽漢學將墜的使命，¹¹³ 然而值得再探論的是兩人對於漢學的汲取或討論，明顯是各呈異調。魏氏漢學觀以孔孟儒學為主，而間涉老墨，他一方面尊崇漢學之精神，表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義忠信，廉節有勇」之理；¹¹⁴ 一方面則取尚同兼愛，闡揚「棄小我而重大我，即今世之自

110 薩依德嘗論評英國作家群作品之觀點（如珍·奧斯汀），則主張對比的內在模式是「空間」而不是「時間」。見Edward W. Said（薩依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頁162。

111 日語稱自己為「自分」，「他分」即「自分」的相對詞。見吳濁流，〈別人無份的世界猶之乎熄火山〉，《東南亞漫遊記》，頁52。

112 《談西說東》文中言及羅馬文化豐厚，反照故鄉台灣，僅台南一點遺跡外，幾乎為文化沙漠，是以台人應建設新文化。（頁32）

113 魏氏對於漢詩觀點，大都發表於各詩集序中。見〈金川詩草序〉，《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152。又吳濁流聽日人即席吟哦漁父辭、觀聽日女士吟漢詩、男士演劍舞後，大為感慨漢詩深入日本國民生活。見吳濁流，〈東遊雜感〉，《談西說東》，頁174-175。

114 魏清德，〈東遊紀略〉，《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258。

他共榮，人類相互扶助共存之主義」，並強調「當此之時，支那古來學說，欲求與現代思想比較的接近者，厥惟墨子。」¹¹⁵由此總攬魏氏「儒墨並尊」的學術態度，¹¹⁶或可管窺魏氏追求用世，激進求變，卻又謹守漢學尊君父、守禮節的「內在性／制約性」精神，復又靠攏皇民同化的心靈結構。審諸吳濁流諸作，大致亦以孔孟教化、漢學為尚，¹¹⁷卻是始終懸繫老莊和陶淵明，他嘗言：「如果沒有老莊和陶淵明，日據時期台灣人當中的知識階級一定有不少會因了那被歪曲政治而高呼人生不可解，選擇自殺之路，或竟而發瘋以終。」¹¹⁸由此推衍，道家自然無為的哲學觀，顯然是吳氏逃逸於認同日本君父體系的思想根源之一。

誠如上述，不同的知識背景、經歷身分和旅遊性質，渡引出遊觀位置、作品內涵、審美趣味、文化認同等等差異性。本文論述以魏、吳兩人的中日行遊體驗書寫為主，及其歷經亞洲移動後的跨文化視域為闡述要點。統整魏、吳中日遊記異同，概有如下四點：

- （一）魏、吳紀遊諸作，透過現代化的想像與追求，關懷命題涵攝有國民性教養、人種優劣論、性別、階級諸多現代思潮議題。這些歷經文化衝突或文化吸收後的旅遊者的「視角中心」，皆未曾離開「本島」或「台灣」位置。誠如魏、吳日本行遊諸作，一為戰前一為戰後，卻不約而同地稱揚日本教養與國民道德，而折衝在諸多瑣碎事件中，關懷的命題毋寧是在日本異域經驗中所投射的「台灣國民病癥」，並亟欲藉此提振台灣國民性而臻於「文明進化論」。

115 魏清德，〈讀墨漫筆〉，《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76、81。

116 1930年代，台灣報刊曾出現儒墨學術論爭之筆戰，主要人物為張純甫、黃純青、連橫等人。此外，魏清德〈讀墨漫筆〉、李春生〈孟子與墨子之較量〉兩作，也涉及儒墨之辯。審諸魏氏所論，近於「儒墨兼治」。相關論述，可參翁聖峰，〈一九三〇年台灣儒學、墨學論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學報》19卷1期（2006.03），頁1-22，以及李威寰，〈論「一九三〇年台灣儒墨論戰」——前史、論述、殖民地情境〉，《台灣文學研究》8期（2015.06），頁99-151。

117 參見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以胡老人（吳濁流作祖父吳芳信為原型之小說人物）所表徵的文化思想傾向：「老人對西洋文化感到一種驚奇，但並不心服。何況是對日本文化呢，認為只不過其亞流罷了。老人的腦袋裡，充滿了對春秋的歷史、孔孟的教化、漢唐的文章、宋明的理學等，光耀的中國古代的憧憬。他認為好歹要把這些傳給子孫。」（頁37）

118 吳濁流，《談西說東》，頁180。〈南京雜感〉文中亦提及逃避思想澎湃狂漲，像陶淵明般的低徊趣味人生觀堅強地抬起頭來……。（頁54）。

- (二) 魏、吳於二戰前展開的中國行旅，時間相近，惟魏清德以「母國人」（日本人）身分出訪，並負有公務考察及開拓報社商業的旅遊任務，域外遊記諸作，概屬即將刊發之新聞報導，且早已預設寫作意圖和閱讀對象，因此寓有親日情結與同化思想，以及觀看文化位階的差異感，也屬情理之常。以致中國遊記儼然形成一種文化批判論述，並藉此「輸出日本」，主張日支親善與「大亞細亞主義」。吳濁流雖也具有日方官報的記者身分，但其中國聞見，主要源於在地視角，因而有「介入者」的深入觀察位置，並意圖勾繪中國性。吳氏以南京為焦距，藉此觀察「中國是污濁之海」，卻具有強大的「同化力」，因此無法排除中國發展出迥異於日本的文化面貌，其另一潛台詞即是中國不必「同化」於日本。
- (三) 比勘魏、吳行遊的跨文化視域，魏清德身處日殖情境中，不得不延續日本帝國樣版修辭下的殖民現代化觀點，而主張亞洲一體觀，並認同現代化的海外「殖民擴張」。由是而觀，魏氏「南圖」思維，意在征服人種、開拓日帝疆界。吳濁流亞洲旅遊諸作既撰寫於脫殖後，因此能放膽針對日本昔時強權支配而予以抨擊，其「南進」信息，主要立基於中美斷交之後，因此以「經濟移民」為導向，意在與華僑合作、鼓勵青年脫美南進。
- (四) 在中國旅途中，魏、吳都曾登臨古城名勝而發思古之幽情，雖隱然流露中國歷史意識，卻終非是「回歸」中國遠祖論調；¹¹⁹ 他們皆經歷固有文化斷裂、修改和塗抹的日本殖民階段，政治立場容或有異，認同的文化卻另有替代性方案的選擇，亦即是對「現代文明性」的認同。所差別者，大半生與日治歷史相終始的魏清德，集中界定的責任為「以日本為本位的東洋文明啟蒙論述」，¹²⁰ 並欲以此教化而登世界大舞台之「台灣新民」；身歷戰前戰後的吳濁流則旨在建設「以台灣為本位的世界

119 見朱雙一，〈魏清德島外紀遊作品芻論——以東亞各地文明狀況的觀察和思考為中心〉，陳惠齡主編，《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第二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7.04）。該文將魏氏遊記諸作，定調為「說明和印證了台灣除了殖民宗主國日本外，其實還有一個更長久的文明輸入源——大陸原鄉。」（頁74）。惟魏清德或對中國有些許「內在承認」，卻非視大陸為更長久的文明原鄉，而魏氏所言「我東亞民族」，實指日本，也非指中國民族。

120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227。

文化共進論述」，¹²¹ 教導台灣青年打破地域觀念，將知識水準求諸世界。就此面向而言，魏清德、吳濁流所意識到的「根源」，皆是以「在地台灣」作為想像詮釋，不是祖傳文化的「中國」，也不是同文異趣的「日本」。

有關日本、中國和台灣三方在日殖民時期所無法化約的「殖民—民族—在地」（colonial-national-local）三角關係，¹²² 使認同的掙扎成為被殖民者的主要論述，而戰前戰後於焉浮現中／日、日／台與中／台等多重決定的歷史情境，也必然使二戰前後台灣知識分子的身分政治與文化認同，憑添多元化和複雜性，更無可規避穿越戰前「成為『日本人』」或「曾經是『日本人』」的艱難，再過渡到戰後「恢復為『中國人』」或「認定是『台灣人』」的歷史軌轍。

見諸魏清德撰於光復後辛卯冬至（民國40年）〈台灣詩選序〉，文中一改昔日親日立場，而痛批日人「欲驅台人為皇民化」，並「禁常用華文台語」，¹²³ 尤其見證了上述歷史過渡的尷尬環節。魏清德或許不是勇於面對主流與權勢者（日帝殖民主）發言的典型「知識分子」，卻也堪稱為彼時引領現代性風潮的先驅者。相較於魏清德，吳濁流於戰前發表極具爭議性的《南京雜感》，可謂為吳氏戰前遊記創作的自由意志與現實環境間的衝撞。至於日本、亞洲各地遊記篇什，大致寫於戰後，源自於歷史環境的不得已，既已得到釋放，書寫更加宏觀。然而從日殖到國府的遊記篇什中，吳濁流的身分認同也確然符應了「亞細亞的孤兒」命題——非中國也非日本的「台灣人」本位，並維持他一貫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本色。

同為引介新知識與文明時趨的報人魏清德與吳濁流，遭逢千古變局，夾處在日本化、現代化與殖化化的歷史罅隙間，最令人稱道者，實為各具記者本色與懷抱。魏清德嘗言他的記者心事：「欲籍民之親善政府，而非徒形式，成

121 吳濁流，《談西說東》，頁173。

122 Leo Ching（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頁237。

123 魏清德，《魏清德全集》肆·文卷，頁355-356。另有〈台灣光復頌〉（《台灣新生報》原刊題作〈台灣光復喜賦〉），也是以歌頌「惟我大中華，廣眾誰能伍」為主調。見黃美娥編，《魏清德全集》貳·詩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頁248。

功發展於海外，男女新學界皆能參酌折衷，不為極端，以舉其精神之實在，則庶幾哉！」¹²⁴ 至於吳濁流則吐露：「視野比較廣闊的新聞記者如果不執筆，將來這個事件的真相，恐被歪曲」。¹²⁵ 從日治時期進入國府時期的魏、吳二人，容或政治理念有異，立場有別，共同承載的目標則皆表顯出提振台人以臻新民，促進時代進步的記者使命，可謂殊途而同歸！



124 魏清德，〈南清遊覽紀錄〉，《魏清德全集》參·文卷，頁161。

125 吳濁流，《無花果》，頁002。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灣》（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04）。
- 文訊雜誌社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94.03）。
- 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04）。
- 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3.05）。
- ，《晚香》（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71.10）。
- ，《無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業公司，1995.07）。
- ，《談西說東》（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69.04）。
- 吳濁流著，張良澤編，《南京雜感》（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
- ，張良澤編，《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
- ，張良澤編，《黎明前的台灣》（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
- ，黃玉燕譯，《亞細亞的孤兒》（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5.04）。
-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07）。
- 林柏燕主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0.12）。
-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4.03）。
-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03）。
-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6）。
-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11）。
- 陳惠齡主編，《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第二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7.04）。
- 彭小妍主編，《跨文化情境：差異與動態融合——台灣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06）。
- 黃美娥編，《魏清德全集》貳·詩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

- ，〈《魏清德全集》參·文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
- ，〈《魏清德全集》肆·文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
- ，〈《魏清德全集》捌·目錄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12）。
- 廖炳惠，〈《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1.06）。
- ，〈《台灣與世界文學的匯流》〉（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6.05）。
- 廖肇亨主編，〈《共相與殊相：東亞文化意象的轉接與異變》〉（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研究所，2018.08）。
- Edward W. Said（薩依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12）。
- Jeffrey C. Alexander（杰夫瑞·C·亞歷山大）等編，吳潛誠總編校，〈《文化與社會》〉（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1997.09）。
- Jorge Larraín（喬治·拉雷恩）著，戴從容譯，〈《意識形態與文化身分：現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場》〉（中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01）。
- Leo Ching（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01）。
- Lydia H. Liu（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06）。
-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往事再現》〉（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11）。

二、期刊論文

- 李威儀，〈論「一九三〇年台灣儒墨論戰」——前史、論述、殖民地情境〉，《台灣文學研究》8期（2015.06），頁99-151。
- 林以衡，〈日治時期台灣文人魏清德東北亞紀行的文明之旅與漢文體驗〉，《漢學研究》30卷4期（2012.12），頁241-274。
- 林淑慧，〈敘事、再現、啟蒙——林獻堂1927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台灣文學學報》13期（2008.12），頁65-92。
- ，〈醫學訪察的記憶：日治時期杜聰明歐美之旅的敘事策略〉，《台灣文學研

究學報》21期（2015.10），頁1-38。

翁聖峰，〈一九三〇年台灣儒學、墨學論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學報》19卷1期（2006.03），頁1-22。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台灣文獻》49卷2期（1998.06），頁1-33。

陳室如，〈日治時期台人大陸遊記之認同困境——以連橫《大陸遊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台南大學學報》41卷1期（2007.04），頁33-50。

陳惠齡，〈從〈東遊紀略〉管窺魏清德漢學觀及其同化論述〉，《經學研究集刊》20期（2016.05），頁87-100。

三、學位論文

白筱薇，〈吳濁流的大陸經驗及其相關作品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徐千惠，〈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四、電子媒體

《国語辞書一大辞泉》（來源：<https://dictionary.goo.ne.jp/word/紀行/>，檢索日期：2019.10.10）。

